

研究論文

改革之聲與改革之生：話語形構如何支持 國企市場化改革（1995-2000）

陳鵬

摘要

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被裹挾進這一浪潮中，並成為國家轉型的重要一環。這一過程尤其體現在上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中，改革帶來了諸多層面的意義錯位，面對這種斷裂，改革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如何合理化這一進程，並為市場化改革創造合乎需要的觀念。本文從話語的社會理論出發，研究將《人民日報》視為政黨國家的話語文本，通過引入福柯的主體性概念對政黨機關報的相關報道進行建構性話語分析，解釋了這一話語實踐過程。基本發現是《人民日報》在推進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話語建構中，部分表述與新自由主義相契合，這些話語將政府主體性建構為去包辦關係，減少干預；將國企主體性建構為自我負責，勇於擁抱市場；將工人主體性建構為不依賴國家，自我承擔。黨報話語建構出一個與市場匹配的框架，其他媒體言說加入其中，最終彙集成支持市場化改革的話語形構。在新自由主義式的話語不斷塑造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市場經濟觀念取代計劃經濟觀念，最終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一，意識形態由此調適出新的內涵並支持國家轉型。

關鍵詞：政黨國家、話語形構、意識形態調適、國企改革

陳鵬，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網絡與新媒體系講師。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數字技術與新聞業變遷。電郵：chenp77@gdufs.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8年7月16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5月10日。

Research Article

The Voice of Reform and the Birth of Reform: How Did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Support the SOE Reform (1995–2000)

Peng CHEN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neoliberalism has dominated the world. China's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s part of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have also been involved in this wa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reform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00. The reform of SOEs brought the dislocation, which the party state had to deal with. The party state had to find ways to explain the reform, make it fit the rule, provide rationalities, and create acceptable ideas for thes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e study tried to understand this process by examining the relevant reports on SOE reforms in the *People's Daily* between 1995 and 2000.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ity and construc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in the *People's Dail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People's Daily* constructed the subjectivity of neoliberalism through discourse formation.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during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ket reform led by the party state in the late 1990s, parts of the statements of the *People's Daily* were compatible with neoliberalism. The government was described as avoid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SOEs were described as embracing the market, while the workers were described a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mselves. This shows that the party's newspaper did not resist

Peng CHEN (Lecturer). Network and New Media Depart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transition.

The Voice of Reform and the Birth of Reform

neoliberalism. Instead, it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that matched it. Other media joined it, and eventually, there was a discourse formation that supported the market orientation reform.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n neoliberal subjectivity, the ideology of a planned economy was dropped and that of the market was set as the core. This adaptation of ideology supported the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1990s.

Keywords: party state, discursive formation, adaptation of ideology, SOE refor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P. (2020). The voice of reform and the birth of reform: How did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support the SOE reform (1995–2000).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3, 163–189.

致謝

衷心感謝黃冬姬教授，匿名評審及編輯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特別感謝李艷紅教授的指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不僅改變了中國自身，也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其最開始集中在政治領域，但在90年代後，經濟改革開始成為國家轉型重心。這一改革是以市場為核心的，因此中國的改革雖然有著明顯的中國特色，卻仍被視為市場化浪潮席捲全球，給世界帶來天翻地覆變化的一個結果(Harvey, 2005; Wu, 2008)。市場化改革帶來勞動分工、社會關係、福利供給、生活和思考方式以及情感習性等諸多改變，這些改變與政黨國家(party state)¹傳統的權力架構、階級關係、政治角色地位等不同，面對改革所帶來的全新意義，政黨國家需要建構出市場化改革的合法性，以支撐政策推行。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以外，改革的一個重要面向是合理化這一進程，為引入市場的改革提供支撐。

本文的研究將以上問題具體放置在上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其始自1980年代，並一直持續至今。其中1995年到2000年，是國企改革政策頻出，改革最為迅猛的時期。國有企業在這一時期首先要解決受計劃經濟體制長期影響，普遍陷入困境的難題，還要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做好準備，這一組織規則要求政府與企業分開，企業獨立面向市場經營(張榮剛、劉小玄，1996；魏杰，1999；楊平，2002；李政，2008)。迅速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諸多變化：國企員工告別單位體制，失去了在公共體系中的結構位置(田毅鵬，2005：169；張靜，2015)。在改革中，穩定的勞動關係瓦解，舊的僱傭關係、勞資關係發生改變(李漢林、渠敬東，2005：198)。工人的社會身份發生改變，下崗工人離開了對制度的依附，物質生活失去保障，變成無人理睬的「邊緣人」，國企工人的職業聲望下降，甚至跌落為社會的底層(佟新，2002)。由於不滿企業改制中的諸多問題，對抗開始出現，此時期內，全國近三分之一的集體抗爭行動都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工資停發、賠償和下崗問題有關(李培林，1998；Cai, 2006, p. 45)。

以上這些現象足以表明，國有企業改革催生了一系列新關係，原有社會關係、社會成員的身份亦變化巨大，由改革而生的新觀念取代舊觀念，政黨國家原有意識形態很難繼續為市場化改革提供解釋。面對國企改革中新出現的權力和社會關係，政黨國家需要展開意識形態重建工作，為改革所造成的意義錯位 (dislocation)² 提供新的解釋，以在行動層面支持改革推進。湯普森 (2005: 7) 指「所謂意識形態就是指特殊情況下意義服務於建立並支持系統地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的方式」，而針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就是「探尋象徵形式所調動的意義是否 (和如何) 在具體背景下服務於建立和支持統治關係」。

話語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象徵形式在建構意識形態中發揮關鍵作用。福柯認為，話語文本對意識形態的作用通過建構主體性實現，這一過程經話語的規訓完成。專門的規訓形塑詞語、事物與知識，而這些受規制的話語又會定義何謂真實，知識的生產蘊含於這一話語實踐過程，因此社會生活中的規則、定義和規範等最終都由受權力規制的話語所建構出，體現權力意志 (Foucault, 2005, pp. 86–87)。權力對話語的運用可以在話語將個體主體化的過程中得到理解。國家製造規則，並通過話語進行闡釋，話語作為一種生成性力量作用於個體，個體通過被規訓的日常知識被建構為主體，主體通過意識和認知受制於他的自我認同，福柯將以上過程稱為國家通過治理術所實現的主體化。在這一過程中，國家通過強制性權力為個體賦予主體性，而個體亦受制於這一主體性 (Foucault, 1982)。因此，話語通過提供合理性 (rationality) 論述，製造出知識客體、社會關係和概念框架。話語作為一種實踐，幫助建構主體和自我形式，支配意識形態形成於話語形構對主體性的製造中 (福柯, 2003)。

因此，將主體性概念作為本文的分析框架，面對改革引發的意義錯位及政黨國家為解釋市場化改革而產製的話語，本研究所關注的問題是，在1995年至2000年間，國有企業迅速實行了面向市場的改革，改革造成了一系列變化，新的身份和權力關係出現，並且這些新生事物在政黨國家原有意識形態之外，無法被政黨國家原有意識形態所解釋，面對這樣的意義錯位，政黨國家如何通過話語形構為國有企業市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場化改革創造合乎需要的主體性？支撐市場化改革的意識形態如何在政黨國家的話語實踐中被建構出來？

文獻回顧：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調適

意識形態調適 (ideology adaptation) 指為匹配改革帶來的政治關係變化，意識形態所進行的調整和改變。政黨國家需要運用官僚機構、媒體和其他宣傳工具重新產製因改革而生的意義，為變化的政治關係提供支撐，意識形態調適由此發生。其突出表現在劇烈迅猛的改革期，巨大的變動和衝突不斷，意識形態因此不斷調整，從而適應國家轉型 (Huntington, 1970, p. 29)。

學者認為，自建國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就一直處於調適中。在毛澤東時期，其表現為由作為革命真理的馬列主義純粹意識形態 (pure ideology) 向指導具體革命的實際意識形態 (practical ideology) 轉變 (Schurmann, 1971, p. 24)。在後毛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被概括為「實事求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為隨後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變化提供了方法論 (鄒讜，2002：143)。

1978年後，中國開啓改革開放，改革帶來舊觀念與權力體系的徹底變革，原有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組織和動員的有效性，政黨國家要調整出新的內容以支持新權力關係，因此，與改革相伴，意識形態總是在話語、義理和論證機制方面進行調適革新 (陳明明，2010)。意識形態調適突出表現在鄧小平與執政黨領導層按照改革實踐對原意識形態進行創造性的重新解釋，對傳統意識形態符號賦予新意義，以此實現意識形態與新時期的適應 (蕭功秦，2008：155)。

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在諸多領域恢復或建立市場。雖然中國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正如鄧小平數次強調的，改革目的是釋放個人和企業積極性，從而提高生產力，實現經濟增長，這一改革目標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涵相匹配。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包括，在原本不存在市場關係的領域著手建立起市場關

係，保障市場的正常運轉，釋放個人、企業的自由和技能，將國家的干預控制在最小限度 (Evans & Sewell, 2013)。新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特徵可以被概括為增強並擴大市場，讓個人和企業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 (Treanor, 2005)，因此雖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在局部呈現為權威主義下的中央控制，但在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社會福利、農村土地承包制等領域的改革實踐表現出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特徵，這被視為「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Harvey, 2005)。

新自由主義改革所釋放的市場活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1992年全面啓動市場化改革後，快速和持續的經濟增長及其帶來的物質改善為執政黨提供了績效合法性，政黨國家不斷進行政策調整維繫績效，目標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這是政府堅決推行一系列以市場為導向改革的原因 (Chen, 2005; Yang & Zhao, 2015)。同時，新自由主義不僅作為一種理論或者經濟制度，也作為一種話語和意識形態，伴隨市場化改革盛行。這一意識形態的基本觀念包括，全球化有利於資本和商品流動，基於個人和企業利益的市場競爭能帶來最大收益，政府干預會破壞市場機制 (Nonini, 2008)。對於中國而言，國家在這一意識形態的形成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現代市場的形成並非源於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是國家干預和暴力的結果。國家權威與私有化過程中的獲利者共同推動市場擴張，將新自由主義的若干原則內化為國家改革政策，這不僅消解了共產主義政權與海外世界在1990年代初的緊張關係，同時通過將市場作為一種國家轉型路徑，阻止了有關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 (汪暉, 2008: 112-113)。

大眾媒體在傳播新自由主義話語和建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旦國家與市場相互疊加，形成合力，那麼國家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統治或者迎合國內外資本利益，就會建立起一套佔支配地位的話語，限制下層勞工的話語權力，以強制維繫市場，保持「社會穩定」。與此同時，大眾媒體本身也在經歷市場化改革，在商業邏輯的驅動下，傳媒可能會因為底層勞工不是廣告商的目標受眾而忽略他們的話語表達和傳播需求。這樣，政治控制與市場邏輯就形成結構上的合力，共同將新自由主義推塑為主導話語 (趙月枝, 200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通過對上世紀末中國的話語場域進行實證分析，學者們揭示出在具體的話語實踐中，新自由主義話語如何作為主導話語遮蔽了可能的意識碎片。針對主流媒體的分析表明，政治精英和專家將加入WTO描繪為讓中國在全球化市場中受益，而有意忽略世界貿易可能給底層工人和農民造成的利益損害，儘管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傳統相悖，新自由主義仍然在密集的對其表示支持的言說中成為一種霸權(hegemony) (Zhao, 2003)。甚至，在以底層為主要受眾，習慣煽情與傳播聾人消息的街邊小報上，新自由主義也作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被延續，下崗工人的困境、沮喪和憤怒在小報上消失，而失業被表述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小報沒有充分反應下層社會群體的視角，反而成為市場自由主義的附庸(Zhao, 2002)。

循著這一路徑，本文試圖進一步分析在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這一重要的「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實踐中，政黨國家如何通過話語建構國有企業改革，這一話語形構如何與新自由主義相勾連，在支持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也參與塑造了新自由主義霸權。這一過程突出表現在政黨國家運用不同話語對變動權力關係中的關鍵主體賦予主體性的過程中。主體性並非一成不變，而隨政黨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政治需求而改變。因此，通過回溯話語對關鍵主體賦予主體性的過程，研究就可以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意識形態的建構過程。

本文聚焦「政府」、「國企」、「工人」，這三個國有企業改革中最重要主體。一系列研究已經闡明了在市場化改革開啓之前，這三者的主體性內涵。針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研究認為，此階段政府主體性表現出集權特徵。1953年底，針對私有制的改造全面展開，政黨國家採取利用、限制和逐步改造等策略將私有產權收歸公有，於1956年建立起公有制經濟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政府統一領導國民經濟，制定指令性計劃，否認或限制商品貨幣關係，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強制性生產計劃指標，計劃滲透到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準則。中央政府高度集權，直接管理企業人事任命、財政收支及物資調撥等相關事宜。政府對經濟領域進行高度政治干預，以此體現政黨國家的政治力量，使自身獲得合理性和正當性(任曉偉，2009：48；Lavigne, 1999)。

針對國有企業的研究表明，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國企制度與蘇聯高度類似，國有企業是政黨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定價、銷售；企業向工人提供福利；企業還作為政府機構的單位，「代表」職工執行一系列政治功能。因此，魏昂德 (Andrew Walder) 將國企主體性總結為控制工人，並使之對政權形成依附的社會機構 (Walder, 1988)。從經濟學視角出發，林毅夫等人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家為企業制定生產計劃、提供原料和資金，作為回報，國企將產出和收入上繳國庫，國企的所有活動都要得到國家批准。因此，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的最典型特徵可以被概括為缺乏自主性 (Lin, Cai, & Li, 1998)。

針對工人主體性的研究呈現出工人主體性一直被大眾媒介依據政黨國家的意識形態任務所建構。建國之初，政黨國家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盡快恢復工業生產，解決各地工人失業問題，由此，工人主體性被建構為「翻身」的勞苦大眾，積極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掌握專業技能的「主人翁」。「文革」期間，階級鬥爭成為政黨國家政治生活的主綫，工業化建設逐漸褪色，工人主體性則被置換為「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反抗者和階級鬥爭的「先鋒隊」(吳暢暢，2014)。在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工人階級始終是政黨國家所依靠的對象，是政黨的階級基礎。

由此，本文的任務是通過對政黨國家話語的細緻分析，呈現出在上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上述關鍵主體被重新賦予了怎樣的主體性，話語實踐如何實現之。研究將重新回望意義的錯位時刻，揭示出面對國有企業改革所帶來的重大變化，政黨國家如何通過話語重塑市場化改革中最重要的「政府」、「國企」、「工人」主體性，實現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調適。

研究方法：建構性話語分析

在具體分析工具上，研究以甘姆森 (Gamson, 1988) 的「建構性話語分析」作為方法，通過「詮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 概念對《人民日報》話語進行分析。甘姆森指出，任何政治事件都是以被建構的方式為公眾所認知的。關於事件的一系列話語以複雜的方式互動，最終生成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義，形成公眾的認知框架，媒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Gamson, 1988)。媒介上表達某種政治觀念的話語相互支持，彼此加強，成為一個統合的整體，這被稱為「詮釋包裹」。「詮釋包裹」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用來陳述事實的「框架裝置」(framing devices)，包括隱喻 (metaphors)、範例 (exemplars)、警句 (catch-phrases)、描述 (depictions) 和視覺圖像 (visual images)，它們建構一個看待事物的框架。另一部分是用來表達立場的「推理裝置」(reasoning devices)，包括根源 (roots)、後果 (consequences) 和體現的原則 (appeals to principle)，它們為某一立場提供原因和解釋理由。在這兩套裝置的運作下，政治事件經媒體的產製，蘊含多種象徵，卻又包含特質，這被稱為「標識」(signature)，它是一系列用簡略的方式反映該「詮釋包裹」核心框架和立場的元素集合 (Gamson & Lasch, 1981, p.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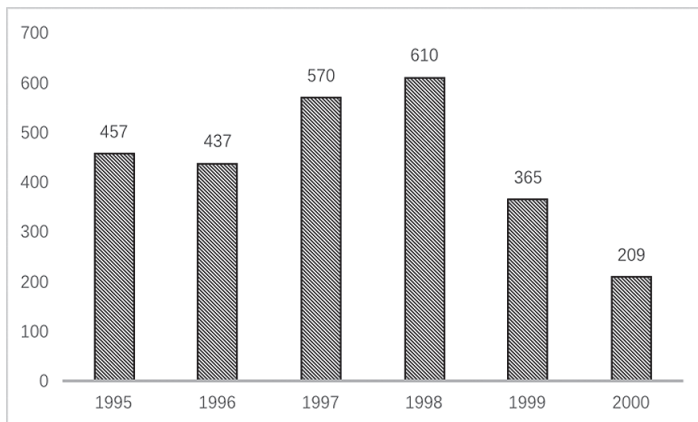
「詮釋包裹」這一概念幫助我們理解政治事件如何通過媒介建構不同「標識」而被人認知。在具體話語文本選擇上，研究將《人民日報》作為研究對象，將之視為政黨國家的話語實踐，這是因為《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其以積極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綫方針政策，積極宣傳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及時傳播國內外各領域信息為目標，是執政黨的重要意識形態宣傳機構，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歷史上，《人民日報》在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重要運動和改革中都發揮了信息發布、宣傳動員、論辯批判等作用，被視為政黨國家話語的一部分，表達中央的意志與看法 (王曉梅，2009；黃旦、周葉飛，2013)。在組織上，《人民日報》受中共中央宣傳部管轄，主要人事由中央任命；在財政上，由政府撥款；在新聞實務流程上，其報道內容受到嚴格管理，尤其是評論，從選題到寫作，再到出版的各個環節都受到嚴格審查，甚至直接由政黨領導人寫作，因此《人民日報》形成一種直接表達執政黨意見的「命令式傳播」(command communication) (Wu, 1994)。

這樣，以1995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國有企業改革最為激烈的時期為階段，研究者通過翻閱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1946–2008)」，對其中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的文本進行摘錄(廣告和專頁軟文除外)，建立起一個涵蓋2,192期《人民日報》、

2,646篇文本，總計近30萬字的語料庫。筆者首先通閱文本，根據文本所涉主題內容對語料進行大致分類，將其歸屬到政府政策、工廠轉型、工人身份、企業主角色、工會、企業破產、下崗職工等不同主題之下。在此基礎上，筆者發現這些語料可以進一步被統合歸置到「政府」、「國企」與「工人」三個主題下，而這正是國有企業改革中最重要三個主體。將文本歸置於這些類目下，研究者就可以分析圍繞國有企業改革的話語如何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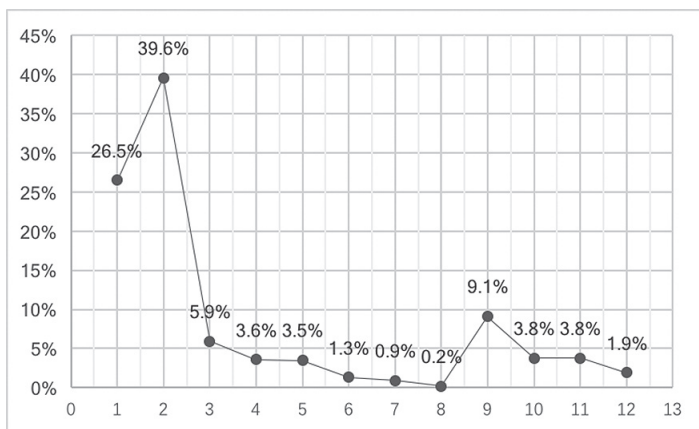
研究同時從文本體裁和所在版次兩方面對文本基本情況進行統計，其情況如圖一、圖二及表一所示。其中圖一呈現出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年度話語文本數量，在國企改革政策頻出的1997和1998年，話語文本數量亦達到峰值，隨後消減，這說明話語伴隨國企改革進程，與之密切相關。圖二呈現出關於國企改革的話語大多出現在頭版(26.5%)、二版(39.6%)、理論版(9版，9.1%)這些重要版面，這表明這一議題在當時的話語場域中佔有重要位置。表一呈現出與國企改革相關的話語多採用消息(48.7%)、評論(24.4%)等「硬新聞」操作手法，這亦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人民日報》重視國企改革，將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文本作為重要言說。

圖一 《人民日報》與國企改革相關文章數量統計(1995-200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圖二 《人民日報》與國企改革相關文章所在版面統計(1995-2000)



表一 《人民日報》與國企改革相關文章體裁統計(1995-2000)

文本體裁	文本數量 (n = 2,646)	佔總文本百分比 (%)
消息	1289	48.7%
新聞特寫及通訊	400	15.1%
新聞綜述	86	3.3%
圖片新聞	22	0.8%
評論(含社論)	646	24.4%
答記者問	52	2.0%
讀者來信	35	1.3%
報告文學	2	0.08%
文摘	4	0.15%
政府報告、領導講話及會議記錄	90	3.4%
其他	20	0.8%

製造「主體性」：《人民日報》與新自由主義主體性建構

接下來研究將進入到具體的話語分析層面，呈現出《人民日報》通過話語支持國企市場化改革的過程。

建構政府主體性：去包辦、減少干預

對政府在市場化改革中角色的話語敘述構成了一個「詮釋包裹」。這一「詮釋包裹」首先包括一個描述政府與企業關係的隱喻，二者關係被比喻為「婆婆」與「媳婦」的關係，政府行為被敘述為「該管不該管的都要管，專好找個碴兒挑個事兒」，導致政府與企業之間總是類似「婆媳」間一樣爭吵不休(1)。³這一隱喻用來說明政府對企業的過度干預及其給企業發展帶來的束縛。

範例是話語通過敘述真實的事件作為例子，用以說明想要表達的觀點(Gamson & Lasch, 1981, p. 5)。話語呈現出一系列政府減少行政干預幫助企業扭虧為盈的例子。例如，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總公司通過這一改革措施獲得經營自主權，在市場中贏得優勢，利潤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這些範例表達的框架是，政府與企業的應然關係是相互分離，要剝離政府對國企的行政管理職能，減少政府干預企業。

這一話語框架還被高度概括為「政企分開」這一警句。在1998年和199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政府明確指出「政企分開」的內涵是轉變企業經營機制，明確國家和企業各司其職(24)，解除政府與所屬企業的行政隸屬關係，不再直接管理企業(28)。政府與國企分開的框架伴隨警句在話語場域中不斷重現。

話語通過一系列描述定義政府角色。這些描述的基本核心是：政府取消用行政手段管理國企。例如，時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洪虎對政府角色的描繪：一是政府不能將企業列為上下級隸屬關係；二是政府不能把國企當做行政機構去管理，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12)。這些表述用以說明政府與以前不同，政府要取消原來的將國有企業視為行政單位的管理辦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話語在對「政企不分」的歸因和對其所導致後果的敘述中表達出行政干預的立場。「政企分開」難以實行被解釋為政府不願向企業放權，仍然受傳統「企業主管部門」思維的影響，沒有意識到要用「歸還」權力的思維來處理與企業的關係(8、13)；而最關鍵的原因則是政府與企業在資產關係上沒有分開，政府沒有建立起專事國有資產投資經營的公司，不是採取市場而是行政手段對國有企業進行管理(8)。在這些話語中，問題被指向政府仍然處在計劃經濟時期中的錯誤位置，仍在對市場中的企業進行不當干預。話語所表達的立場是，要改變這些錯誤的政府行為，建立起減少干預、權力下放的政府。

這一立場還在話語對政府干預企業經營行為所導致後果的敘述中表達。例如，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發文總結了「政府越界」所導致的六大弊端(25)。與之相反，政府減少對企業包辦的後果則被闡釋為有利於企業發展，因為政府減少了對企業的干預，有助於企業面向市場自我管理；同時政府與企業分離，意味著企業減輕了對社會的負擔(6)。在這些話語表述中，政府被敘述為應該與企業分離，不再包辦企業，避免干預企業經營。

最後，這一話語「標識」被裹挾在自改革開放以來，政黨國家在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中所確定的具體規則中。「簡政放權」是自1979年以來一系列改革的基調，在1980年代，政黨國家經歷了以「黨政分開」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這一系列改革所確定的原則是減少政府對非行政部門的干預，這一原則支持了政府與企業分開的立場。

以上研究考察了話語對國企改革中政府角色的言說，其「詮釋包裹」構成元素如表二所示。其核心框架可以被概括為，政府對企業的行政干預是計劃經濟的殘留，影響企業參與市場經營活動。其核心立場是，政府干預企業經營行為導致國企陷入困境，因此政府要與國企分開，避免干預國企經營。這一「詮釋包裹」建構出不同於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主體性，新的政府主體性支持政府與國企脫綁，政府不再對企業全權負責，不再強制性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政府退出對企業的包辦關係，讓企業面向市場參與競爭。在新自由主義中，政府角色被定位為建立市場運行機制，保障市場正常運轉，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因此我們說，經話語重構的政府主體性與新自由主義對於政府角色的

規定相契合，政府主體性由此被建構為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化改革首先在話語對政府主體性的重構中被支持。

表二 《人民日報》建構政府主體性的「詮釋包裹」構成 (1995–2000)

「詮釋包裹」元素	主要內容
隱喻	「婆婆」與「媳婦」
範例	減少政府干預，企業成功轉型
警句	政企分開
描述	政府不能將企業列為上下級隸屬關係；政府不能把國企當做行政機構去管理
根源	政府不願意放權是導致「政企不分」的原因；政府與企業在資產關係上沒有分開，導致國企陷入困境
後果	政府越界的後果帶來種種弊端；政府減少干預的後果有助於企業面向市場自我管理
體現的原則	1979年以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

建構國企主體性：自負其責

國企要依靠自身，通過內部改革扭虧增盈的「詮釋包裹」經大量的範例被表述。範例呈現出鎮海煉化、無錫小天鵝、山西南風化工集團、澳柯瑪集團等企業通過細化內部管理，找到契合企業的發展方式，自我開放創新，通過挖掘企業自身潛力，實現企業資產保值增值(4、9、29)。最典型的範例是邯鋼的管理經驗，邯鋼經驗被總結為企業主動面向內部求改革，不依靠外部政府扶持。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性條件由此被敘述為在企業自身，國企要自我負責，而非等靠國家(15)。

「不等、不靠、不要」這一警句表述出國有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不應等待政府扶持，不應依靠政府政策，不應向政府伸手討要資金，而應該自力更生，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這一話語在黨報上大量傳播，表達出對企業自身作用的強調，其對國企的定位是擺脫與國家的依附關係，在市場中謀求發展。

話語描述稱國企的主要問題在企業內部。例如，話語稱國企存在的問題包括觀念陳舊、紀律鬆弛、管理不嚴、基礎工作薄弱、領導素質不高、決策能力差(5)。話語還稱國企改革要與科技進步結合，將科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技創新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但技術進步要從國企自身需求出發，自我負責(7、11)。這些話語表達的框架是，國企改革要從企業自身出發，通過解決內部問題提高能力，國企要擔負責任，靠自己而非政府扶持面對改革。

企業要自我承擔負責的立場在「詮釋包裹」的「推理裝置」中被表述。話語將影響企業管理的根源歸結於企業內部。例如，話語將造成國企困境的原因歸為領導班子存在「等、靠、要」的工作惰性；不願在技術改造、基礎管理、產品開發等方面下功夫(2)。企業科技人員作用沒有發揮的原因是「一些企業領導者任人唯親，不尊重知識，束縛了科技人員創造性的發揮」(3)。這些話語表達的立場是，企業觀念落後，領導班子水平低，內部管理不完善，內部環境不利於技術創新等自身問題是導致國企陷入困境的原因。

這一立場還在話語對國企實施對內改革後果的論述中表達。加強內部管理被宣稱為解決國企問題的「良方」，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徑，內部管理與扭虧為盈之間存在必然聯繫，話語稱只要內部管理和改革結合起來，企業就會產生巨大的發展潛力(5、10)。與之相反，對內經營管理不善的後果是造成國企虧損，「據有關部門統計，三分之二的虧損企業都是由於管理不善造成的」(27)。即便企業爭取到了國家政策，但管理鬆垮，出現漏洞，國家的扶持政策就會喪失作用，談不到真正扭虧脫困(29)。這些話語將國企經營問題與企業自身相勾連，從而表明企業自身要對經營負主要責任。

以上我們考察話語對國企改革中企業主體性的言說，這一「詮釋包裹」各元素可以被歸納為表三。其核心框架是國企改革的關鍵在企業內部，國企依靠自身可以擺脫困境，不要等靠政府扶持。話語所表達的立場是，自身問題導致企業陷入困境，國企要自己解決發展問題。由此，話語將國企主體性建構為，要自我負責，勇於承擔，發揮自身能力，通過對內改革實現扭虧增盈，不等靠政府。這一主體性有別於計劃經濟時期，彼時國有企業是政黨國家的附屬機構。新的國企主體性強調企業自身能力，指出國企要獨立面對市場競爭，靠自己解決發展中的難題，而這與新自由主義對於企業的定位相契合。新自由主義強

調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認為企業要擁有自主性，擺脫對行政政策的依賴，參與市場競爭，自負盈虧。因此，經話語建構，計劃經濟時期的國企主體性被新自由主義式的國企主體性取代，面向市場的改革在話語對國企主體性的重構中得到支撐。

表三 《人民日報》建構國企主體性的「詮釋包裹」構成 (1995-2000)

「詮釋包裹」元素	主要內容
範例	通過內部改革扭虧增盈；不依靠外部政府扶持
警句	不等、不靠、不要
描述	國企內部存在一系列問題
根源	國企內部問題導致企業困境
後果	加強內部管理帶來企業增長

建構工人主體性：自我承擔

話語對工人主體性的敘述主要集中在再就業議題上，言說工人的「詮釋包裹」首先包括範例，下崗工人靠個人奮鬥再就業的故事在《人民日報》上被大量呈現。在這些範例中，再就業的典型形象是轉變觀念，戰勝自我，忘記國企身份，勇於走向社會 (23)；能夠經得起坎坷，不怕再就業過程中的失敗，重頭再來 (19)；直面現實，勇於吃苦，自強不息 (16)；此外，還要善於學習新的技能，提高自身能力 (19)。一系列敘述所表達的框架是，再就業工作要依靠工人自己。

圍繞再就業工作的描述也參與形構了這一話語框架。在這些話語描述中，再就業工作被敘述為不能由政府勞動部門統包，要面向市場，發揮政府、企業、勞動者和社會的共同作用。其中最關鍵的是工人自身要轉變觀念，樹立新的擇業觀，不能追求崗位好、收入高，卻不吃苦受累 (18、20、26)。

言說「工人要自我承擔」的要素還包括視覺圖像，它指的是用圖畫或照片表達出與「詮釋包裹」相關的框架 (Gamson & Lasch, 1981, p. 5)。視覺圖像呈現出下崗工人自強不息，靠轉變觀念和個人努力實現再就業，例如有圖像呈現出下崗職工通過賣饅頭，集資自辦食品加工廠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新上崗。圖像中，曾經的下崗工人在新工作中開懷大笑，不見愁雲亦沒有自謀出路的艱辛，表現出轉變觀念，重新就業的快樂(22)。圖像表達的意義是面對下崗，工人要轉變思維，不怕吃苦，靠個人奮鬥上崗，話語由此強調了工人的個人能力和責任。

工人要面向市場自我負責的立場在「詮釋包裹」的「推理裝置」中被清晰地表達出來。與話語框架相配，解決再就業問題的最大因素被歸為個人思想觀念轉變，類似的表述如，「人們在思想觀念上的禁忌和不適應，是影響當前就業和再就業的最大障礙，也是人們感到就業難的根源之一」(14、17、26)。另外，影響再就業的因素還有下崗職工自身的職業素質水平。例如，有話語稱只有不斷充實自己，掌握新技能，才能使自己具備重新擇業的競爭力(19、26)。在這些歸因中，話語強調工人自身因素對再就業的影響，個人觀念和素質被描述為造成再就業難的主要原因。

這一立場還體現在對轉變就業觀所導致後果的論述中。個人轉換就業觀念帶來的後果是找到工作，重新上崗，甚至開始新的人生，二者被敘述為存在必然聯繫。類似的話語如，「打破狹隘眼界，面向所有就業崗位找出路，就一定能走出閃光的人生之路，創業之路」(17)。適應新環境，提高個人素質的後果也被敘述為必然能獲得新的機會。而把握住這一機會的後果是變被動為主動，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順暢(21)。

以上「詮釋包裹」各元素通過表四總結呈現，其基本框架是工人要告別對國家的依賴，面向市場；要提升素質，為新崗位做好準備；同時還要不怕挫折，增強自信。其所表達的立場是，個人觀念和素質是造成再就業難的原因。經由這些話語敘述，工人主體性被建構為要面向市場，轉變觀念，提高個人素質，擺脫對政府的依賴。這一重塑的工人主體性與計劃經濟時代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主人翁」位置不同，工人主體性被建構為與國家脫離依附關係，自我承擔，發揮個人能力，參與市場競爭。這一新的工人主體性與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觀念相契合，新自由主義同樣強調個人能力和自主性，並且認為個人要參與市場競爭，對自身行為和生活安康負責，擺脫對國家福利的依靠。

因此，我們可以說，國企改革話語所建構出的工人主體性飽含新自由主義特質，市場化改革在話語對工人主體性的重構中被支持。

表四 《人民日報》建構工人主體性的「詮釋包裹」構成 (1995–2000)

「詮釋包裹」元素	主要內容
範例	下崗工人靠個人奮鬥再就業
描述	再就業不能由政府勞動部門統包分配；工人自身要轉變觀念
視覺圖像	下崗工人自強不息，靠轉變觀念和個人努力實現再就業
根源	個人思想觀念轉變和素質提高是再就業的原因
後果	個人適應新環境，提高素質的後果是獲得成功

結論與討論：話語形構與國企市場化改革

以上分析呈現出話語形構如何通過重構市場化改革中最重要的政府、國企、工人三個主體，在意識形態層面幫助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研究表明，意識形態調適實現於政黨國家通過話語賦予政府、國企、工人新自由主義主體性的過程中。這些話語形構包括，稱政企不分導致企業經營出現問題，政府要避免用行政方式干預企業；稱國企要擺脫對政府的依靠，靠加強對內管理和自我科技革新實現扭虧增盈；稱工人不要依附政府，要自我負責，提高素質，靠個人奮鬥實現再就業。經這些話語形構，政府主體性被建構為不再以行政方式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支持企業參與市場競爭，不再包辦企業和個人事務；國企主體性被建構為：面向市場，依靠自身能力解決問題，擺脫對政府的「等、靠、要」；工人主體性被建構為自我承擔責任，依靠個人素質和能力參與競爭，而非依賴政府。這些新的主體性不同於計劃經濟時期，後者的主體性指向政府與企業同構，國企是體制的一部分，工人依附單位；而新的主體性與新自由主義取向契合，認為政府干預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個人和企業要靠自身能力參與競爭，在市場中自負盈虧。在話語敘述中，政黨國家重新建構了政府、國企、工人主體性，市場的合理性在這一過程中被解釋，支撐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意識形態也由此被製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由此，本文從一個微觀角度入手，通過考察《人民日報》這一政黨國家最為重要的話語，細緻地描繪出上世紀末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調適過程。這一結論與此前有關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調適文獻彙集到一起，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市場化改革。對於中國而言，引入市場的改革帶來經濟增長和績效合法性，但因改革而新生的觀念又會與原有觀念衝突，上世紀末的國有企業改革就集中體現了這種意識形態交迭。趙月枝 (Zhao, 2002) 等人的研究說明了商業媒體和小報在這一過程中的可能遮蔽，在這類媒體的表述中，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霸權，將底層排除在外。本文則進一步指出黨報在確立新自由主義霸權中發揮關鍵作用，為了將市場化確立為改革方向，在推進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話語建構中，黨報的部分表述與新自由主義相契合，這些話語架構出一個市場主導框架，並以此重塑了改革對象的主體性。如果將當時整個大眾媒體的言說視為一個更大的話語場域，則黨報和商業報紙及小報一起，構成了一個塑造意識形態的工程，在這一工程中，黨報將市場化確立為改革方向，其他媒體的言說與之呼應，這些話語彙集到一起表達對市場化改革的支持。伴隨這一不斷實施的意識形態工程，市場觀念取代計劃經濟觀念，最終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一。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這種新自由主義導向的市場觀念並不與1970年代以來盛行於歐美的新自由主義完全相同。雖然在本文所指國有企業改革領域，為了推進市場化，改革主體被賦予了新自由主義主體性，但研究無意也無法證明政黨國家權力在彼時期全面衰退，這與中國的情況並不相符。在中國，新自由主義與權威主義並存，國家操控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Cao, 2000)。在話語場域中，這表現為關於「國家權威」和「市場化改革」的話語同在，研究結論並不是說新自由主義話語是這一時期黨報的唯一表述，本研究所做的工作是指出那些與建構「市場化改革」有關的話語形構並討論其可能的意識形態後果。

但本文也不同意將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完全割裂。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如研究所示，市場化改革伴隨新自由主義確立，但在中國官方話語中，新自由主義卻與市場化改革分隔，這種否認可

能會掩蓋市場化帶來的問題。因為一旦不承認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的關係，那麼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就與市場化無關，市場化成為解決國家積重，幫助企業和個人發展的「萬能鑰匙」，而其所帶來的犧牲則被選擇性忽視。例如，與《人民日報》上泛濫的支持市場化改革的言說相反，其報導極少呈現下崗職工的艱難生活。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在《人民日報》上，我們發現只有16篇文本表達出再就業的艱辛和對下崗者的同情立場，這些文本佔語料庫文本總數的0.6%。這表明，在話語將市場建構為意識形態核心的過程中，改革所帶來的不公以及那些自我承擔改革後果的犧牲者在話語場域中被邊緣化了。政治精英擁抱市場，卻壓抑了底層表達，市場是被讚美的對象，而不見對其反思。正如湯普森(2005: 65)所指「象徵形式調動意義來服務於建立和支撐統治關係」，在本研究中，話語即作為一種象徵形式，其所服務的是建立和維持不平等的社會權力。在這種建構意識形態的動機中，市場化改革所引發的貧富差距、對廉價勞動力的剝削和社會公平等問題被政黨國家有意忽略，威權式的新自由主義表達維護了支配性社會秩序。

本研究的局限之處是，研究沒有採取抽樣方法而直接對總體進行考察，這極大地增加了研究者工作量，同時受限於數據庫本身特點，研究最終沒有對語料進行更細緻和多層次的內容分析。這對本研究的影響是，雖然在質化上，研究呈現出《人民日報》的話語框架，卻似乎仍缺乏量化數據進一步豐富結論。研究者最初的設想是除建構性話語分析之外，再用計算機輔助分析的方法對《人民日報》文本進行內容分析，這可以更全面地呈現彼時《人民日報》的話語特徵，並幫助研究結論更加穩健。現有結論源自研究者在通閱語料庫基礎上的統計與總結，雖然作為一項話語分析，本研究方法與結論適配，但研究者仍然承認更多層次的內容分析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民日報》的話語建構，並補充可能的疏漏。

本研究的另一個局限是，研究關注的是政黨國家話語形構的表徵，卻沒有進一步深入討論其生成作用，即本研究的主要關切是政黨國家通過話語建構主體性，調適意識形態的努力，而在話語對社會實踐的影響方面討論不足。但正如費爾克拉夫所指，「話語不僅反映或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徵社會實體和社會關係，也建構或構成它們……話語分析要分析這些話語的社會效果」(Fairclough, 1992, p. 3)。

本文可先對此進行簡單討論。從研究所討論過的範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推行市場化改革的正面典型成為其他國企和工人學習的榜樣，這表明話語鼓舞了企業和工人擺脫國家走向市場，依靠自我走出困境的實踐活動；而話語將等靠國家的範例作為反面典型的結果是，國企和工人避免在實踐中重蹈覆轍，成為類似的失敗者。這一初淺的觀察表明，面向市場的改革實踐在話語的建構作用中被固定下來，與市場相關的新的生產制度、生產方式，如合同制、按件計酬、績效考核、末位淘汰等市場化生產制度也在話語敘述中被接受。遵循這一路徑，本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是，關注話語對於社會實踐的生成性作用，其中的一個重要面向是政黨國家話語與生產政體(factory regime)⁴之間的關係，這一議題關注話語如何參與其間，幫助政黨國家及與之密不可分的國企合謀形塑新的工人管理模式。當然，更完整的知識獲得取決於更廣泛的觀察，除文本以外，對於話語生成作用的研究還需要走進工廠和工人，了解話語對個體的影響，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幫助我們更深入地認知話語與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

註釋

- 1 本文所指的政黨國家 (party state) 即中國。政黨國家是政治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分析概念，它指涉一種國家類型，中國屬這一類型國家，卻又呈現出獨特的特徵。其集中表現為，政黨國家是一個複合體，官僚制的政黨結構「嵌入」及「重組」了國家/政府結構，具體可參加景躍進、陳明明、肖濱在《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一書中的論述。
- 2 任何意義都將面臨無法再為人們對世界的感知提供一套具有說服力的、合法化模型的時刻，這被成稱為「錯位」(dislocation)。詳見De Vos, P. (2003). Discourse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ideological (trans-) formations. *Pragmatics.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 13(1), 163-180.
- 3 本文收集和分析的話語資料數量較為龐大，所列文本是經對語料庫進行建構性話語分析作結基礎上的舉例。為避免文獻引用過於冗贅，我們在所使

用的材料之後標註編號，並按發表時間順序將其整理在附錄中，其餘話語材料則作為抽象概括的素材。文中凡引用材料，除非特別註明，皆來自附錄諸項，可按號索引。

- 4 布洛維將工廠管理與工人權利之間結構化的固定關係稱為生產政體，其用來指涉生產領域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詳見Burawoy, M.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pp. 159–164). London: Verso.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曉梅 (2009)。〈一次注定失敗的新聞改革——對1956年人民日報改版夭折的探討〉。《新聞記者》，第10期，頁18–22。
- Wang Xiaomei (2009). Yici zhuding shibai de xinwen gaige—Dui 1956 nian Renmin ribao gaiban yaozhe de tantao. *Xinwen jizhe*, 10, 18–22.
- 田毅鵬 (2005)。《「單位社會」的終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Tian Yipeng (2005). *Danwei shehui de zhongji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任曉偉 (2009)。《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歷史和理論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 Ren Xiaowei (2009). *Shehui zhuyi jihua jingji de lishi he lilun qi yuan*.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米歇爾·福柯 (2003)。《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Michel, F.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 Mixieer Fuke (2003). *Zhishi kaogu xue* (Xie Qiang, Ma Yue, Trans.). Shanghai: Shenghuo · dushu · xinzhì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Michel, F. [1969].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 約翰·B·湯普森 (2005)。《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高銛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Yuehan B Tangpusen (2005). *Yishi xingtai yu xiandai wenhua* (Gao Xia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李漢林、渠敬東 (2005)。《中國單位組織變遷過程中的失範效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3期(2020)

- Li Hanlin, Qu Jingdong (2005). *Zhongguo danwei zuzhi bianqian guocheng zhong de shifan xiaoyi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李政(2008)。〈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問題回顧與評析〉。《政治經濟學評論》，第2輯，頁36–50。
- Li Zheng (2008). *Zhongguo guoyou qiye gaige de lishi wenti huigu yu pingxi. Zhengzhi jingjixue pinglun*, 2, 36–50.
- 李培林(1998)。〈老工業基地的失業治理：後工業化和市場化——東北地區9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調查〉。《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3–14。
- Li Peilin (1998). *Lao gongye jidi de shiye zhili: hou gongyehua he shichanghua—Dongbei diqu 9 jia daxing guoyou qiye de diaocha. Shehuixue yanjiu*, 4, 3–14.
- 陳明明(2010)。〈危機與調適性變革：反思主流意識形態〉。《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6期，頁104–107。
- Chen Mingming (2010). *Weiji yu tiaoshi xing biange: fansi zhuliu yishi xingtai.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6, 104–107.
- 楊平(2002)。〈加入WTO與國企改革〉。《嶺南學刊》，第1期，頁29–32。
- Yang Ping (2002). *Jiaru WTO yu guoqi gaige. Lingnan xuekan*, 1, 29–32.
- 吳暢暢(2014)。《傳媒、現代性與工人階級主體性探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Wu Changchang (2014). *Chuanmei, xiandaixing yu gongren jieji zhutixing tanjiu*. Beijing: Zhongguo guangbo dianshi chubanshe.
- 佟新(2002)。〈社會變遷與工人社會身份的重構：「失業危機」對工人的意義〉。《社會學研究》，第6期，頁1–12。
- Tong Xin (2002). *Shehui bianqian yu gongren shehui shenfen de chonggou: “Shiye weiji” dui gongren de yiyi. Shehuixue yanjiu*, 6, 1–12.
- 鄒讜(2002)。《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Zou Dang (2002). *Zhongguo geming zai chanshi*. Xianggang: Niujin daxue chubanshe.
- 汪暉(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Wang Hui (2008). *Qu zhengzhizhuan de zhengzhi: duan 20 shiji de zhongjie yu 90 niandai*. Shanghai: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 shudian.
- 張榮剛、劉小玄(1996)。〈國有企業的債務困境及其原因——湖北鋼絲廠的案例分析〉。《經濟研究》，第2期，第59–60頁。
- Zhang Ronggang, Liu Xiaoxuan (1996). *Guoyou qiye de zhaiwu kunjing ji qi yuanyin—Hubei gangsi chang de anli diaocha. Jingji yanjiu*, 2, 59–60.

- 張靜(2015)。〈通道變遷：個體與公共組織的關聯〉。《學海》，第1期，頁50–58。
- Zhang Jing (2015). Tongdao bianqian: geti yu gonggong zuzhi de guanlian. *Xuehai*, 1, 50–58.
- 趙月枝(2007)。〈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期，頁23–50。
- Zhao Yuezhi (2007). Guojia, shichang yu shehui: cong quanqiu shiye he pipan jiaodu shenshi Zhongguo chuanbo yu quanli de guanx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 23–50.
- 黃旦、周葉飛(2013)。〈「新型記者」主體的改造與重塑——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之再考察〉。李金銓(編)，《報人報國》(頁325–35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Huang Dan, Zhou Yefei (2013). “Xinxing jizhe” zhuti de gaizao yu chongsu—Yanan Jiefang ribao gaiban zhi zai kaocha. In Li jinquan (Eds.), *Baoren baoguo* (pp. 325–354).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蕭功秦(2008)。《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北京：新星出版社。
- Xiao Gongqin (2008). *Zhongguo de da zhuanxing: Cong fazhan zhengzhixue kan Zhongguo biange*.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 魏杰(1999)。〈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思路〉。《管理世界》，第6期，頁122–128。
- Wei Jie (1999). Guoyou qiye gaige de xin silu. *Guanli shijie*, 6, 122–128.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Cai, Y. (2006).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Cao, L. (2000). Chinese privatization: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3(4), 13–62.
- Chen, C. (2005).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China in the mirror of Eastern Europe.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2(4), 3–13.
- Evans, P. B., & Sewell Jr., W. H. (2013). Neoliberalism: Policy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social. In Peter A. Hall & Michèle Lamont (Eds.),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pp. 35–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777–795.
- Foucault, M. (2005).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Routledge.
- Gamson, W. A. (1988). The 1987 distinguished lecture: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11(2), 161–174.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3 期 (2020)

- Gamson, W. A., & Lasch, K. E. (1981).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CRSO Working Paper No. 242.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70).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n.p.: Basic Books.
- Lavigne, M. (1999).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Basingstoke: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 Lin, J. Y., Cai, F., & Li, Z. (1998).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2), 422–427.
- Nonini, D. M. (2008). Is China becoming neoliberal?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8(2), 145–176.
- Schurmann, F. (1971).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eanor, P. (2005). Neoliberalism: origins, theory, definition. *Reperibile all'indirizzo*. Retrieved from <http://web.inter.nl.net/users/Paul.Treanor/neoliberalism.html>.
- Walder, A. G. (198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u, F. (2008).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Neoliberalization as establishing a market society. *Geoforum*, 39(3), 1093–1096.
- Wu, G. (1994). Command communication: The politics of editorial formulation in the People's Daily.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194–211.
- Yang, H., & Zhao, D. (2015).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91), 64–82.
- Zhao, Y. (2002). The rich, the laid-off, and the criminal in tabloid tales: read all about it! In P. Link, R. P. Madsen, & P. G. Pickowicz (Eds.),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pp. 111–13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Zhao, Y. (2003).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s on the WTO. In C. C.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pp. 32–55).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陳鵬 (2020)。〈改革之聲與改革之生：話語形構如何支持國企市場化改革 (1995–2000)〉。《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53 期，頁 163–189。

附錄 正文援引《人民日報》語料基本信息 (以發表時間順序排序)

序號	發表時間	作者	文本標題	版次
1	1995年1月27日	本報記者莫新元	婆婆和媽媽	2
2	1995年2月6日	遼寧省撫順市市長陳家洱	搞好企業先搞好班子	10
3	1995年2月8日	遼寧撫順石油化工研究院 鄭偉	充分發揮企業科技人員的作用	9
4	1995年2月17日	本報評論員	勇於推進兩個轉變的典型	2
5	1995年2月21日	本報訊	深入開展轉抓練增活動	1
6	1995年2月22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 主任馬洪	解放思想深入實際扎實工作促進 發展	9
7	1995年5月15日	河北省省長葉連松	靠科技加快經濟發展	1
8	1995年5月25日	本報記者杜飛進	實現政企分開要在制度創新上下 功夫	1
9	1995年6月2日	本報訊	澳柯瑪成冰櫃行業排頭兵	9
10	1995年10月6日	國務院總理李鵬	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 議的說明	9
11	1995年10月22日	本報訊	加強企業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 方式	5
12	1995年11月21日	體改委副主任洪虎	深化企業改革壯大國有經濟	2
13	1996年6月8日	新華社記者李四清	政府要依法行政真正做到政企分 開	2
14	1996年8月31日	新華社記者吳複民	上海構建再就業良性循環新機制	1
15	1996年9月3日	本報記者王彥田	學邯鋼是否不講外部環境了	2
16	1997年3月26日	建達	敬佩強者	11
17	1997年5月20日	劉玉輝	轉變觀念天地寬	9
18	1997年10月8日	本報記者潘剛	下崗職工：觀念更新天地寬	2
19	1997年10月10日	本報記者王斌來	再就業一道新的起跑綫	9
20	1997年11月17日	編者	共同關心再就業工程	9
21	1997年12月15日	馬利	把握好人生的轉折點	11
22	1998年1月16日	楊俊江	下崗職工走出一片新天地	3
23	1998年2月18日	本報記者李麗輝等	機會偏愛有技能的人	2
24	1998年3月21日	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	1,2
25	1998年6月11日	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	改革政府機構實行政企分開	10
26	1998年7月23日	倪豪梅	做好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工作的 幾個問題	10
27	1999年2月8日	本報記者潘帝都	提高經濟質量和效益	1
28	1999年3月18日	國務院	政府工作報告	1,2
29	2000年1月19日	本報評論員	在強化管理上下功夫	1